

评陶渊明

——《陶渊明集》校注代前言*

逯钦立

(东北师范大学 中文系,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陶渊明是没落的门阀世族出身的地主文人, 他的世袭阶级地位决定了他有浓重的门阀观念和忠于一朝一姓的封建主义思想, 也决定了他的思想信仰——青年时期信仰经学, 壮年以后信仰玄学。陶渊明所坚持的玄学家的自然观, 其本身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兼备的矛盾性。陶渊明的“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表现在坚持门阀观念并维护家族地位而不与刘裕新政权合作, 同时又逃避现实, 过着隐士生活。陶渊明不单单是“浑身静穆”, 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陶渊明的饮酒诗反映了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没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桃花源记》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 是陶渊明诗文中的特殊成就, 但《桃花源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反映了作者的落后世界观。

关键词: 陶渊明; 阶级; 个人主义; 宇宙观; 陶酒; 隐居; 评论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931 (2016) 04-0003-27

一、陶渊明的封建门阀世族家庭和文化教养

陶渊明生于东晋兴宁三年(365), 逝于宋元嘉四年(427), 是我国四五世纪之间的著名诗人。从他的卒年算起, 距今已经一千五百四十五年了。

陶渊明的生活时代——东晋末年——是个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社会动乱不宁的时代。当权的门阀世族大地主, 大量兼并土地, 奴役剥削大批佃客、部曲和奴婢。他们“爨山封水, 保为家业”, 劳动人民“薪采渔钓, 皆责税直”。使得“百姓流离, 不得保其产业。”当时的“北府兵”和“西藩兵”是东晋地主政权镇压人民的两大军阀势力, 表面上用他们抵御外侮, 实际上用来镇压人民, 维护其残酷的封建剥削。以赋税来说, 官府规定老百姓“以十六为全丁”“十三为半丁”^①, 每丁征粮达五十石以上。“郡大田武吏年满十六, 便输米六十斛, 十五以下至十三, 皆课米三十斛”^②, 地位低微的兵家或营户也备受勒索。以徭役来说, 所谓“古者使人, 岁不过三日; 今之劳扰, 殆无三日休停”^③。所以逼得老百姓“残形剪发, 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 鳏寡不敢妻娶”^④。或者“年及应输, 便自逃逸”^⑤。残酷的封建剥削压迫, 迫使广大农民不断起来反抗。从宁康二年(374)到太元十八年(393), 这十九年中, 农民暴动见于史书记载的有六次之多。隆安三年(399)发生了以孙恩为首的较大规模

收稿日期: 2016-06-07

作者简介: 逯钦立(1910—1973), 男, 山东钜野人, 教授, 研究方向: 古代文集和汉魏六朝诗的校勘与研究、陶渊明研究。

引文格式: 逯钦立. 评陶渊明——《陶渊明集》校注代前言[J].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6, 33(4): 3-29.

* 本文为逯钦立先生1972年5月25日重订的遗稿。本刊得到逯先生家属的授权, 并遵照家属尊重遗稿原貌的要求, 在此予以全文发表。因逯先生当年所参考文献的具体出版信息已无从查考, 故在编辑本文时, 充分尊重原作, 只把文内注改为脚注, 余不做任何变动。逯先生家属对此遗文的说明见文后“附录”。在此对逯先生家属予以本刊的充分信任真诚致谢!

① 《晋书·范宁传》。

② 《宋书·徐豁传》。

③ 同①。

④ 同①。

⑤ 同②。

的农民起义。说明阶级斗争的日益激烈。这些暴动或起义暂时被镇压下去。

但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昨天为他们镇压人民的官兵，今天就成为他们本阶级自行内讧、互相残杀的工具。开始是地方军阀王恭、殷仲堪同东晋中枢权贵王国宝等的兵连祸结，接着是刘裕同桓玄、刘毅、司马休之等的连年火拼。并且，从元兴二年（403）到义熙十四年（418），十五年间，桓玄、刘裕对东晋皇朝前后发动了两次篡夺帝位的政变。一些门阀大地主消灭了，一些新起来的封建权贵胜利了。凡此都引起了社会的动荡，而广大人民群众在战乱中更是颠沛流离，受尽了苦难。

陶渊明是江州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江州，地当荆扬要冲，一直是封建军阀的必争之地。在频繁战争骚扰破坏下，这一地区人民所遭受的掠夺、蹂躏和伤亡，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史称此地“百姓疲匮，岁月滋甚，财伤役困，虑不幸生”，“民疲田芜，事役繁苦。童耄夺养（无人养活），老稚服戎”^①，“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②。江州一带的战乱频仍，封建统治的残酷黑暗，使一些士大夫阶级对局势悲观失望，对从政丧失信心，因而悲世归隐一时形成风气。著名隐士如翟汤后裔翟矫、翟法赐、刘遗民、周续之等，都是江州一带的人。生活在寻阳柴桑的陶渊明，对于封建社会现实的感受和认识应该同上述一些人是同样清楚和深刻的。他的逃禄归耕，终于成为“寻阳三隐”之一，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了。

陶渊明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诗人，有他的社会根源，更有他的阶级根源。

陶渊明是个没落的门阀世族出身的地主文人。他的曾祖是东晋开国功臣陶侃，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已成为东晋贵族。他的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他的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陶茂不是陶侃长子，不曾接替陶侃的爵位，从陶侃到陶逸，陶家三代当官僚，住在江州的这个陶家已成为门阀，即颜延之所谓的“洪族”了。到陶渊明这一代，刚到八岁就死了父亲^③，家庭破落了，生活艰窘了。所谓“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藿不给”^④。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从这样一个家庭出来做官吏，依次当了祭酒、参军、县令，不容讳言，陶渊明是个没落的门阀世族地主文人。他的家庭条件，所谓“独有田庐归”^⑤，别业、田园，开始时基本上能维持他下野后的地主生活。他的世袭阶级地位，也决定了他的门阀观念和忠于一朝一姓的封建主义思想。

陶渊明所受的文化教养，又是他成为这样一个诗人的思想根源。

东晋末年如此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那就是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特别活跃起来，而江州恰恰是各种思潮互相斗争的典型地区。

约在太元五年（380），三礼专家范宣，在江州豫章开始提倡“经学”，为这个地区的经学研究开创了风气^⑥。豫章和寻阳是毗邻的。太元十六年（391），豫章太守范宁，继范宣之后进一步提倡“经学”。他大力设乡校，吸收四姓大地主子弟充当学生，人数扩充到几百人。课读五经，“讽诵之声，有若齐鲁”。从此“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史称这是“化二范之风”^⑦。也就在这一年，五斗米道的虔诚信奉者江州刺史王凝之，不但鼓吹道教迷信，而且大力为佛教迷信鸣锣开道，在他的支持下，庐山和尚慧远集合了八十多个国内外僧人，用了将近一年时光来翻译佛经。这是慧远宣扬佛教迷信的第一步。王凝之一方面支持庐山慧远，和他一起散布宗教迷信，把佛教、道教都树立起来；一方面上疏皇帝，攻击范宁不应兴办乡校浪费资财。这场官司打了好几年，可见道教、佛教同经学之间的激烈斗争。隆安二年（398），慧远写出他的《明报应论》。这篇东西，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麻醉毒害的对象当然是广大人民群众，但它又是作为一种教义针对桓玄等标榜“自然”的道家玄学而给以攻击

① 《宋书·武帝纪》。

② 《晋书·刘毅传》。

③ 《祭从弟敬远》：“相及韶齿，并罹偏咎。”李公焕注：“韶与龠义同，毁齿也。家语曰，男子八岁而龠。靖节年三十七母孟氏卒，是偏咎为失怙也。”

④ 颜延之《陶徵士诔》。

⑤ 曾巩：《过彭泽》。

⑥ 参看《晋书·范宣传》《晋书·戴逵传》《晋书·武陵王晞传》。

⑦ 参看《晋书·孝武帝纪》《范宁传》《宋书·范泰传》《晋书·王忱传》《范宣传》。

和否定的。这又说明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佛教和道家玄学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而且此后不久，桓玄作《沙门应敬王者论》，来贬抑佛教，慧远马上作了《沙门不敬王者论》来反对桓玄。这样，佛学与经学之间也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

太元五年（380），是陶渊明十六岁的时候。江州经学盛行，陶渊明是受了影响的。这个影响从十六岁一直持续到三十几岁。他自己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愤慨“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饮酒》）。又说：“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中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而且在《荣木》诗中还说“总角闻道”，指明所闻的是“先师（孔子）遗训”。这些话都表明陶渊明在青壮年时期是十分信奉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儒家经学，并把它当作自己生活的道德规范。

但是，隆安二年（398）到元兴三年（404），当陶渊明三十四到四十岁的时候，桓玄的道家玄学和慧远的“佛教报应论”正在展开论战。陶渊明三十九岁作的《饮酒诗》，被研究家们歌颂为“静穆”“伟大”的“结庐在人境”篇，就已经表述了作者对“自然”之义的修养和受用。陶渊明体验道家玄学如此之深，竟然将它运用到自己生活实践上去，可见这和当时玄学佛教之间反复的长期的斗争，具有重大关系。

综上所述，除了阶级地位决定陶渊明的思想意识以外，江州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青年时期服膺经学，“游好在六经”，到了壮年以后，就已经从经学信仰转到信仰玄学。经学也好，道家玄学也好，都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作为门阀地主文人的陶渊明，他的这种转变也并没有超越其阶级思想的羁绊。

当然，陶渊明四十岁后，在从事耕田劳动中接触了下层社会生活，这种实践活动对他的思想起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他的诗文创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使他成为一个有独特成就的诗人。

二、陶渊明的浓厚的门阀观念

东晋是门阀世族垄断政权，门阀制度森严的时代。门阀世族凭仗“九品中正制”，把他们垄断世代选官的特权合法化。他们把封建统治者，划为清流、上品，并把再高者标榜为风流名士。把被统治者划归浊流、下品，称他们为下材、寒人。他们又施行“依品占田”和“荫客”制，在经济制度上使门阀世族有合法特权，从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森严的封建等级制。门阀世族高踞养尊处优的阶级地位，看不起下品浊流或乡里小人，以世袭门阀的“高贵”而自豪，这就是当时最基本的门阀观念。

作为门阀世族文人的陶渊明，有着浓厚的门阀观念，这在他的部分诗文中和言行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请看他的《命子》诗：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世历重光。……穆穆司徒（陶叔，周），厥族以昌。（其一）

於赫愍侯（陶舍，汉），运当攀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壘壘丞相（陶青，汉），允迪前踪。

（其二）

桓桓长沙（陶侃，东晋），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其五）

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陶茂）。於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愜喜。（其六）

在诗里，陶渊明首先标榜他陶姓是唐尧的后代，这是封建士大夫的一般习气。按《世说新语·容止篇》，北来的门阀世族温峤瞧不起陶侃，把陶侃称为“溪狗”，应当是有根据的。再按《陶侃传》，侃幼年很穷，他并非门阀贵族。只是陶侃给东晋皇朝建立过大功，位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经过陶茂、陶逸三世官位相继，陶这一家族才成为江州寻阳的“洪族”，即门阀世族。显然，陶渊明在这里和其他地主官僚一样，用假冒的手段说明自己的氏族传统的可贵，力图使人相信他的先祖来自陶唐。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陶侃本人已经成为地主贵族，所谓“天子畴我，专征南国”。陶家据有了

新门阀的地位。接着，陶茂是“直方二台，惠和千里”，起码做过太守。陶逸又是“寄迹风云”的安城太守。虽然陶茂父子不是陶侃的嫡派子孙，经过世代当官，寻阳陶家同其他门阀贵族已无本质上的不同。陶渊明《赠长沙公》诗，一方面说“於穆令族，允构斯堂。……我曰钦哉，实宗之光”，感慨“昭穆既远，已为路人”，但是想到“遥遥三湘”与“滔滔九江”的家族关系，而不能不“念兹厥初”“同出大司马”了。这可见他浓厚的门阀观念不是无中生有的，江州这家陶姓之为门阀，已经是名实相符。

陶渊明的门阀观念也表现在他的当官方面。

他第一次出仕做官就当了一个江州祭酒。这时是东晋太元十八年（393），他已经到了“向立”年二十九岁了。他的《饮酒》诗云：“畴昔（过去）苦长饥，投耒（放下农具）去学仕（学做官）。……是时向立年，去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记载了他第一次出仕的年龄。当时江州刺史是王凝之^①——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一个门阀官僚，一个五斗米道的狂热信奉者。江州祭酒，不同于一般祭酒。据《宋书·百官志》，这个江州祭酒，又叫别驾祭酒，职权大，“居群僚之上”，“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这个祭酒是东晋咸康年间王羲之当江州刺史时才特别设置的。陶渊明是个门阀世族，这次当了门阀世族官僚的幕僚，又是个职位很高的幕僚，为什么感到耻辱呢？为什么不能忍受这种吏职而“少日自解归”^②呢？千百年后这是不容易解答的。幸而史传记载使我们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晋书·隐逸传·陶潜传》说陶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莲社高贤传》同）“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陶渊明这句愤慨的话，《宋书·隐逸传》和《南史·隐逸传》都作“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文字稍有出入，意思是一样的。这句话，变成今天比较通俗的语言，就是“我过去都不能对五斗米道江州刺史王凝之下腰鞠躬，今天还诚恳地伺候你乡下小百姓？！”陶渊明是用当前的态度来对比过去，用过去的历史来强调当前。贫寒家庭出身的督邮，他是鄙视的，看不起的，显赫一时的门阀官僚刺史王凝之，他过去也不曾服气！可见陶渊明这句话生动地表现出他的那种强烈的门阀观念。

陶渊明不干州祭酒，是在太元十八年（393），他任彭泽令是在义熙元年（405），前后相距十三年，从他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其间耕田、做官，有了多种的反复的社会实践。而他的这个门阀观念，还强烈地保持住，说明他的门阀家庭和阶级地位在他思想上打的烙印很深，是不容易改变的。

陶渊明的门阀观念，还表现在他的那种追求、模仿他的同阶级的门阀贵族的“风流雅事”上。个体事例就是他五十岁时所做的斜川之游。西晋门阀贵族石崇，元康六年（296）在他的别业金谷搞过大型集会，游宴赋诗。东晋门阀贵族王羲之，永和九年（353）在其田庄中的兰亭，集合广大朋辈，搞“修禊事”，游宴赋诗。他们用这种河川上的集会，炫示其田庄的广袤，生活的阔绰高贵，实质上是在医治其寄生生活的无聊。他们这两次游宴，规定每个参加者都要赋诗，赋诗不成的要罚酒。为集会写下叙文，把集会的年月日和参加者的年纪、乡里全记录下来。值得注意的是，石崇《金谷集》年纪最大的是苏绍，五十岁，列为第一名。王羲之的《兰亭集》，刚好选在他自己五十岁那年来举行，显然是有意识的^③。那么，陶渊明的游斜川，作《游斜川》诗，“与二三邻曲，……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也选在他自己五十岁那一年，当然也是有意识的。有意识地同石崇、王羲之比门阀贵族的“高情逸致”，有意识地在可能条件下继承石、王等的“风流雅事”。阶级相同，观念相同，好尚也不能不相同了。

陶渊明游斜川，作《游斜川》诗，仿效石崇、王羲之，不但表现他们之间的阶级相同，观念相同，好尚相同，而且还表现出他们彼此之间那种相同的没落地主阶级的颓废的思想情调。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就石、王、陶等前后三次游集中的诗文写作进行考察、分析和比较。《游斜川并序》：

① 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吴廷燮《东晋方镇表》。

② 《宋书·隐逸传·陶潜传》。

③ 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时五十有三，永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书。”（见冯武编《书法正传》），上溯至永和九年，正五十岁。

辛酉，正月五（上）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独秀中阜，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

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迴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觴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

细按整篇作品，其中充斥着无非是一些人生无常、及时行乐、以酒消忧、乐极生悲等没落地主阶级消极颓废的思想情调。在这一点上，陶渊明与石崇、王羲之可以说毫无二致。这里先用石崇的《金谷诗序》对比一下《游斜川》诗序。《金谷诗序》说：“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叙时人官号、姓名、年纪云云。”《游斜川》诗序则说：“悲岁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其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思想内容和文字形式，彼此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再用王羲之的《兰亭集》对比一下《游斜川》诗。《兰亭集》序云：“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感慨系之矣。……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王羲之《兰亭集》诗又云：“取乐在一朝，寄之齐千龄。”“合散固其常，修短定无始。造新不暂停，一往不再起。于今为神奇，信宿同尘滓。谁能无此慨，散之在推理。”而《游斜川》诗则说：“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念之致动中怀，及辰为兹游。”“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觴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不难看出，王、陶和石崇一样，都在感叹人生无常，强调及时行乐，宣扬以酒消忧，思想情调是十分相似的。

陶渊明五十岁后，生活越来越贫困，却这样热衷于仿效石、王，搞斜川之游，诗又写得如此消极悲伤。这只能说明他的门阀观念并不是伴随他门阀地位的破产而消失。

三、陶渊明当隐士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实质

陶渊明正式当隐士是在彭泽弃官以后。各史陶传都有这样几句话：“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这里“弦歌”用《论语·阳货》子游为武城宰事，以“弦歌”两字代表当县令。“三径”用《三辅决录》蒋翊开三径事，以“三径之资”代表隐士的资用。“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是说姑且当县令赚取当隐士的资本。可见陶渊明要当县令是在为当隐士作准备，而从彭泽弃官归隐回家自然就是宣示下野当隐士了。

封建士大夫这种把出任县令当作由仕宦到退隐的桥梁，在当时是不乏其例的。和陶渊明并称为“寻阳三隐”的刘遗民，其行径就和陶渊明完全相同。释慧远为刘遗民作的传云：“刘程之，字仲思，彭城人。……陈郡殷仲文，谯郡桓玄，莫不崇拭。禄寻阳柴桑，以为入山之资，未旋几时，桓玄东下，格称永始，逆谋始，刘便命驾，考室林藪。义熙公候咸辟命，皆逊辞以免。九年，太尉刘公（裕），知其野志冲邈，乃以高尚人望相礼，遂其初心。居山十有二年卒。有说云：入山以后，自谓是国家遗弃之民，故改名遗民也。”^①这里所谓“禄寻阳柴桑，以为入山之资”，和“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说通过当县令赚取点当隐士的资本。陶渊明、刘遗民的行径竟然如此雷同，可见那种从县令过渡到隐士已经是当时封建士大夫长期间形成的一套退隐公式。

又据《晋书·安帝纪》《桓玄传》，元兴二年（403）十二月三日，桓玄篡位称大楚，改元永始。十二月十二日，把晋安帝迁到寻阳。刘遗民的入山退隐就在这年冬。而陶渊明的彭泽弃官在义熙元年（405）十一月，比刘遗民只晚两年。他们退隐方式如此相同，时间又如此相近，值得注意。

封建士大夫本来有田有庐有财产，可以过肥遁生活，为什么还要搞当县令赚隐士资本这一套呢？据东汉以来士大夫的传统习气，这样搞无非借此自玷自秽，向封建统治者表示屈服。因为：一方面，当县令勒索人民，蒙上贪污嫌疑，就没有资格再沽名钓誉、收买人心，失掉同封建统治者争夺政权

^① [唐]释元康：《肇论疏》引《刘遗民传》。

的可能性，封建统治者也就放心了；另一方面，表示过了官瘾，愿意从此老死田园，永远“不问政治”，这种退却行为符合封建统治者对下野者的要求。这样搞，由仕宦到隐退，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无形中解决，封建统治者彼此共同维持，皆大欢喜，可以心照不宣了。不难理解，陶渊明沿用士大夫这种传统办法来引退，正是向本阶级的封建统治者表示的一种妥协行为。如果把当隐士只说成是对封建统治的消极反抗，至少是不全面的了。

封建统治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当官当隐士是封建士大夫特有的双重权利。“天下有道则见（仕），无道则隐”，成了维护封建士大夫这种特权的理论根据。封建皇朝是需要隐士的，这在陶渊明时代也是如此。《晋书·桓玄传》说：“（桓玄篡晋后），玄以历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已世独无。乃征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著作，并给其资用，皆令让而不受，号曰高士。时人名为‘充隐’。”很明显，这是由于新的皇朝成立，一定有许多地主官僚下野，但只要他们表示甘心当隐士，封建统治者便对他们表示优遇。就是“充隐”吧，新皇朝也能够以此点缀太平，宣示新皇朝是应天顺人的，已经无人反抗了。其次，新的皇朝成立，封建士大夫也需要以当隐士为退路。他们对新的封建统治无力反抗，只好当隐士不参与政治。当了隐士，封建皇朝无非不给他官做，并不损害他个人的地主阶级利益。他回到自己田庄，还是受保护，安享不劳而获的地主生活，甚而能受到皇朝的旌表诏封，抬高了地位荣誉。而且当了隐士，也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毫无疑问，封建士大夫的出仕与退隐都是维护封建统治、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陶渊明当隐士，即使不好说是“充隐”，也和一般地主阶级文士没有本质区别。

陶渊明当隐士，又是有地主阶级物质条件和思想根源的。这个门阀世族文士，虽然家庭是破落了，但田庄别业还有好几处：闲居、田园居（古田舍）、栗里（南村或南里）等；凡是他的居住所在地，几乎都是他的田庄别业所在地。陶渊明的前半生时常表现出一个门阀世族对庄田别业的迷恋。请看看他当官前后的一些诗篇。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中，作者说：

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又《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说：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

按隆安三年己亥（399），桓玄袭杀荆州刺史殷仲堪，即代其任，自称荆州、江州二州刺史，陶渊明仕于桓玄，获得“好爵”（好的职位），应当是从这年开始。隆安四年庚子（400）作的《从都还》诗，是受桓玄命出使京都的。隆安五年辛丑（401）作的《赴假还江陵》诗，是从寻阳还荆州桓玄官府销假的。至少从庚子到辛丑这两年是他当桓玄官吏的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当官有好职位时，还是念念不忘他的园林田庄，闲居别业，而不以当官作公差为可贵。

元兴三年甲辰（404），建武将军刘裕率刘毅、何无忌等，举“义兵”推翻桓楚政权，本人任镇军将军，这年陶渊明从江州东下就任镇军参军职位，作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诗中仍然这样说：

……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义熙元年乙巳（405），陶渊明任刘敬宣的建威参军，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云：

……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

这个日梦想的田园，便是他当隐士的靠山。没有林园田庄，没有吃的住的，隐士是当不成的。隐士思想所以在仕宦期间已经萌芽，逐步形成，也正因为他还拥有赖以生活的田庄别业。在上举这些诗中，虽然他不断地提出，要“戢柵守穷湖”（《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要“养真衡茅下”（《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生活上是“被褐”“屡空”（《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只不过是家庭衰落的夸张叙述，并不能证明陶渊明已经丧失了赖以生活的物质条件。

一个田庄别业迷，出仕当官时，对园林山泽居迷恋不已，下野隐居时，对这些东西自然喜爱备至。这里让我们看看他隐居以后的《归去来兮辞》和《归园田居》有关这方面的描述吧。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中车，或棹孤舟。（《归去来兮辞》）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

辞和诗特别写出他的田庄别业是多么充满着魅力和诱惑力。宽大幽静的庐舍，广阔四向的园田，茂密繁盛的榆丛果林，以及供主人出游的舟车，供主人使用的僮仆。好个田庄别业，够陶渊明安享地主寄生的生活了。有理由认为迷恋田庄别业是他当隐士的重要因素之一。

陶渊明当隐士，从另一方面说，决定于新政权建立以后，旧朝贵族阶级的趋于沦亡。《宋书·隐逸传》叙述他“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刘裕）王业渐隆，不复肯仕”^①，封建史家提出的这个当隐士的原因是可信的。他们抓住了陶渊明忠于一朝一姓的封建主义思想本质。

另外，没落门阀地主与新起“寒人”势力之间的阶级矛盾决定着陶渊明的必然退隐。陶渊明门阀观念很重，看不起所谓“乡里小人”，即寒门出身的新起官吏。这在前面已经举例提到了。刘裕等新军阀集团的灭桓兴晋，虽然受到陶渊明的响应与拥戴，但是，刘裕、檀韶等，不是出身于贫苦农民，就是出身于寒门布衣。他们的家世，他们的行动，又必然是陶渊明所轻视和鄙视的。义熙十二年（416），江州刺史檀韶，邀请“寻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在城北公廨领导着祖企、谢景夷等，讲校礼经，兴办文化事业。讲校地点，接近马厩。这件事竟然引起了陶渊明的不屑和愤慨。他写了《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诗，表示他瞧不起三个人屈从檀韶，而实质上是鄙视檀韶，认定檀韶在马队办文化是可嗤可笑的。诗云：

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寻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愿言谢诸子，从我颍水滨。

所谓“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在他看来，“乡里小人”请人在马队讲礼校书，简直是唐突古人，无理取闹。周、谢、祖三人未免是自轻自贱。这是他不屑参加的，所以结尾两句话是在拒绝周续之等的相邀，而全篇则表现了对刺史檀韶的轻蔑。陶渊明这年五十二岁，过了十多年的“躬耕自资”的生活，还是这样倜傥地表露了门阀地主的顽固态度。那么，回溯到他当年离开彭泽县衙时，他的“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那句话，就不单单表明强烈的门阀观念使他看不起“乡里小人”督邮，而且进一步表明：正是在旧门阀贵族与新起来的地主政权之间的矛盾激化的时候，死抱住门阀观念和偏见的陶渊明，因为不屑担任新的封建统治者的官吏才最后一次决定下台了。

然而这还只是重要因素的一个方面。

东晋是门阀世族垄断政权、门阀制度森严的时代。但自义熙元年（405）刘裕执政以后，新起来的地主阶级势力，成为军政大权的实际支配者。他们通过一些巩固和加强新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措施，例如“土断”“蠲免”户调等，政治上发生明显变化，“政出多门”的东晋皇朝暂时转变为中央集权。门阀贵族中的当权派有些受到镇压，门阀世族阶级逐步走向灭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陶渊明利用刘裕集团中一批参军们改任地方县令的时机，提出同样要求，当了彭泽令，并把这任县令当作由仕到隐的桥梁。

作为门阀世族后代，陶渊明是有意识这样做的。正如颜延之称赞他的“长卿弃官，稚宾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赋辞归来，高蹈独善”^②，这样做也是有其苦衷的。新的封建统治势力和门阀世族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突然达到敌对状态，陶渊明出身门阀，做过桓玄官吏，有“不洁去就之迹”的污点，容易成为株连的对象。这种地主阶级内部冲突、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使他感到忧惧和不安，从参军转为县令，套用这种传统公式，安稳地过渡到退隐，应该看到

① 萧统：《陶渊明传》《晋书·隐逸传》《南史·隐逸传》，略同。

② 颜延之：《陶徵士诔》。

陶渊明思想上庸俗的一面，也要看到他思想上懦弱的一面。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政治风险，使他惶惶不安。他认为只有用逃避的一条路来保全首领。他的经验之谈是“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说来说去，无非从自己出发，从个人出发。为自己的免遭杀身之祸，为自己的门阀“荣誉”，为自己的安享别业生活，终于采取了这样一个退隐的做法。关于这一点，《归园田居》和《感士不遇赋》有比较真实的流露：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第一首）

诗还写得轻松些。把自己的出仕当官看成误落人间罗网，把自己的回到园田比作鱼鸟的脱离樊笼，返回自然界。但是，《感士不遇赋》却是这样叙述的：

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

这是赋的中心内容，值得注意。这篇赋是和《归园田居》诗同时的作品，抒写最后走上隐居道路的愤慨心情。赋的结尾说：“既轩冕之非荣，岂缁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卒岁，谢良价于朝市。”就是明白的证据。陶渊明过去做了桓玄官吏，封建史家认为是一大污点，贬斥他“不洁去就之迹”。本赋中有云：“雷同毁誉，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应当就是针对这件事而提出的申诉。也说明赋是在彭泽辞官回家后写的。现在再回到上引的一段“赋”，“赋”的大意是：世界发展越走越远了，人类开始有集团划分，相互间形成差异。封建统治者制造了天罗地网，被统治的落入网罗有似骇鱼惊鸟。通达的人是容易觉悟的，便逃避官禄回到农耕。这段“赋”，主题思想、比喻文字等，和上引的《归园田居》诗基本相近，但情调却大不相同。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一个没落门阀地主那种在新的封建政权统治下要求摆脱现实、唯恐遭受不测的惊惧之情。决不单单是对一般的封建政治的否定，而是就刘裕等翦除门阀地主权贵的严峻措施而发的。因而全段赋是如此的低沉、凄厉和悲凉。

可见门阀地位在破灭、生怕成为东晋新政权的翦除对象，是陶渊明下野归隐的重要因素的又一方面。如果只强调他的门阀观念使他拒绝与刘裕等“乡里小人”合作，因而解职归田，那还是不够全面的。

四、陶渊明的“民主个人主义”

陶渊明，这个东晋功臣的后代，他抱持着门阀观念，而他的门阀地位都由于东晋的没落而没落。他抱持着忠于一朝一姓的封建主义，而他在当官过程中所事过的桓玄、刘裕又是两个前后篡夺晋朝的人物。东晋的灭亡和改朝换代的大变化，对陶渊明的门阀地位不能不有所破坏，从而使他产生很大的愤慨和悲伤。

陶渊明有些诗文是发抒了这些悲愤情愫的，但由于在新朝刘宋政权统治下，他既要表达他的思想感情，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奋笔直书，于是在用典用事、遣辞造句上，每故弄玄虚，夸饰附会，写出了简直是哑谜式的东西。具体例子便是《述酒》诗。还有一类作品，表面是歌咏古人古事，实质是借题发挥，达到作者“颂古非今”的要求。这里先根据宋汤汉的《陶靖节诗笺注》和我的《述酒诗题注释疑》，把《述酒》诗试译成现代语，并附缀一些可以作为注释的话，以便融会贯通，加深我自己的了解。

原文	译文
仪狄造，	酒，仪狄造了，杜康又重酿。
杜康润色之。	（以酒的制造和重酿比喻桓玄、刘裕相继篡夺，愈演愈烈。）
重离照南陆，	作为东晋象征的重离，这太阳在南中国照耀，
鸣鸟声相闻。	开国时的贤才多，像凤凰在互相鸣叫。
秋草虽未黄，	秋草虽然还没有黄落，
融风久已分。	夏天的热风早已散消。
素砾晶修渚，	桓玄想应运称帝，在江中堆起的大沙渚映照着九十九洲，
南岳无余云。	象征中兴的南岳紫云就无影无踪。

豫章抗高门，
重华固灵坟。
流泪抱中叹，
倾耳听司晨。
神州献嘉粟，
四灵为我驯。
诸梁董师旅，
芊胜丧其身。
山阳归下国，
成名犹不勤。
卜生善斯牧，
安乐不为君。
平王去旧京，
峡中纳遗薰。
双阳甫云育，
三趾显奇文。

王子爱清吹，
日中翔河汾。
朱公练九齿，
闲居离世纷。
峨峨西岭内，
偃息得所亲。
天容自永固，
彭殇非等伦。

豫章公刘裕的高门和桓家的对立起，
负禅代之名的重华，只落得一堆神秘的高塚。
眼泪汪汪心里怀着悲叹，
长夜不眠听鸡叫直到天明。
中原人民献给晋帝的嘉禾落到刘裕手里，
符瑞中的四灵为当皇帝的刘裕“效征”。
有似沈诸梁起兵，刘裕调动了师旅，
有似白公胜的下场，楚桓玄丧了性命。
有似山阳公，晋帝废黜，迁到下国去了，
让位的晋帝终于被害，得到的是谥法上的“不勤成名曰灵”。
卜式很会牧羊，他提出了“恶者辄去”这个篡权的秘诀，
晋帝的近臣，也如山阳公的相臣安乐一样，对皇帝毫无所用。
像平王离开京师，晋安帝被迁到寻阳，
像王子搜被薰一样，晋恭帝不得不把帝位继承。
昌明（晋孝武帝名）刚说生下来了，（“晋祚尽昌明”的讖言可以不算数了。）
但象征司马氏应运称帝的红老鸦预示将亡的奇文又出笼。
（当时又有讖书云：“昌明之后有二君”。刘裕将为禅代，故密令王韶之缢帝。）
如同爱吹笙的王子晋之寿龄，在刘裕统治下，晋祚延续了十七年，
像唐尧的河汾之游，这个晋丧失了天下。
我陶某要练养生术，
住在“闲居”，却遭受到人间纠纷。
伯夷、叔齐的高大形象留在西山里，
隐退的我得到亲人。
天老、容成自然是永垂不朽的，
八百岁的老彭与活几天的小儿不一样大！

嗜酒成癖的陶渊明，挖空心思写了这篇《述酒》诗反对桓玄、刘裕篡夺晋朝，他的心情是愤慨的。他以为桓、刘的篡夺都牵连到酒。桓玄为了篡夺，用毒酒杀了司马道子，刘裕称帝以前，用毒酒害了晋安帝乃至晋恭帝。于是针对这一点，以“述酒”做标题，以“仪狄造，杜康润色之”为题注，写成他这首斥责桓、刘，哀悼东晋的哑谜式的挽诗。

在诗中，陶渊明反复申诉桓玄、刘裕前后篡夺中的阴谋、诈术、军事争夺、符瑞迷信和废立暴行等等，把桓、刘视为一丘之貉，不加区别地一律加以诅咒。桓玄是一个门阀和军阀余孽，他的夺权篡国没有丝毫进步意义，陶渊明反对他、揭露他，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出身农民刘裕和他领导的新的政权集团，代表了新起的地主阶级，则不同于桓玄一伙。他们镇压了门阀军阀余孽，翦灭了南燕（盘踞山东、河北的慕容超）、后秦（盘踞关中一带的姚泓）而光复了中原，诛灭了民族败类谯纵而结束了四川的割据。接着采取了“土断”等一些多少带有民主性的措施，改革了东晋的腐败政治局面。社会秩序得到安定，社会生产获得某些发展。刘裕等新的政权集团的起来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陶渊明把刘裕、桓玄等同起来，同样加以暴露攻击，则是不应该的。诗的结尾六句，尤其值得注意。六句话揭示出这样一点，即陶渊明是不折不扣地以伯夷、叔齐之心为心，坚决要继承他们弟兄的衣钵。

伯夷、叔齐的思想和行径，据《史记·伯夷列传》，他俩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因为孤竹君有遗嘱要叔齐继位，就主动让位逃开了他的国。叔齐认为王位应该是长子继承，不愿以弟代兄，也逃开了他的国。后来他们又在东海会合在一起。武王伐纣，他们反对，认为是“以暴易暴”。周平定全国以后，他们耻食周粟，隐在首阳——西山，饿了就采薇充饥，唱出“登彼西山”一首歌，梦想黄虞时代。后来就饿死在西山。陶渊明是要继承夷、齐的这种思想和行径的。他的《读史述九章》

证明了这一点。“九章”的第一章“夷齐”说：“二子让国，相将海隅。天人革命，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贞风凌俗，爰感懦夫。”用韵文概括了《史记》，概括得很好；又借《孟子》的话，对夷齐如此歌颂，比起韩愈的《伯夷颂》可以说捷足先登，这值得我们注意。我认为陶渊明写《述酒》诗、《读史述九章》之前不但是已经以夷齐之心为心，而且早已以具体实践继承了他们的行径。他反对刘裕代晋，“耻复屈身异代”。下野当隐士，写《述酒》《读史述》等以泄愤，同情“夷皓有安归之叹”（见《感士不遇赋》）。躬耕自资，甘愿忍受饥寒。因此，他歌颂夷齐，实际是肯定和宣扬自己。稍加对照就明白了。《读史述九章》的写作，本身就是对夷齐思想行径的全盘继承。更确切点说，他是在实现伯夷、叔齐的思想，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毛主席有一段话教导我们：

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①

我认为陶渊明的“民主个人主义”思想就表现得很突出。一方面，他坚持门阀观念，维护他的家族地位，不与刘裕新政权合作；个人安危第一，逃避现实，过着隐士生活。江州刺史檀道济探望过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②这几句话很有道理，打中了陶渊明的要害。可是没有说服这个“民主个人主义”者。陶渊明这种开小差以后的“固穷”，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是“自苦”，在当时人民看来，也只能是消极应付了。

模仿伯夷、叔齐的开小差、当隐士、逃避现实，陶渊明这种无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就要导致封建士大夫的“悲观主义”。发为文章便产生了像《闲情赋》一类作品。

《闲情赋》是一篇模仿古代辞赋的寓言作品。因为是寓言，不容易理解，曾经招致了梁朝萧统的误会和曲解。萧统《陶渊明集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意思是这篇赋像白玉上带有斑点，它玷污了陶渊明的诗文。宋朝苏轼讥笑了萧统，说“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③，认为这篇赋做到了“《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④苏轼这个论断是很对的。《闲情赋》正是继承楚宋玉、汉张衡、蔡邕等辞赋的艺术形式而抒发作者的生活思想的。

从宋玉《高唐》《神女》二赋、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类书引作《检逸赋》）到陶渊明的《闲情赋》，各赋之间有个传统意境一直相承不变的，那就是假托追求女子爱情的失败比喻追求功名理想的失败，来叙写封建士大夫个人中心的“悲观主义”。这个意境创始于屈原的《离骚》，是《离骚》丰富内容中的一个部分：用天国梦境演出作者向神女们追求爱情而失败的故事，当作全篇的插曲。但是，这一梦境，宋玉《高唐赋》《神女赋》却单独把它继承下来，集中在一个高唐神女加以描绘，就完全形成一个“悲观主义”的主题了。这显示了屈、宋之间的明显差距。张、蔡两人的赋，则又略去宋玉梦境的安排，只袭取了它追求爱情的部分，并且把神女改变为人间美人。范围愈来愈狭了，“悲观主义”愈来愈突出了。而陶的《闲情赋》则又是完全模仿张、蔡，没有丝毫的特殊创造。现在把张、蔡、陶三赋列在下面，作一对照：

《定情赋》

夫何妖女之淑丽，
光华艳而秀容。
断当时而呈美，
冠朋匹而无双。……
（见《艺文类聚》十八）
思在面而为铅华兮，
患离尘而无光。

《检逸赋》

夫何姝妖之媛女，
颜炜晔而含荣。
并天壤其无俪，
旷千载而特生。……
（见《艺文类聚》十八）
思在口而为簧，
鸣哀声独不敢聆。

《闲情赋》

夫何瑰逸之令姿，
独旷世而秀群。
表倾城之艳色，
期有德于传闻。……
愿在衣而为领，
承华首之余芳。
悲罗襟之宵离，

① 《别了，司徒雷登》，见《毛泽东选集》四卷横排本，1384页。

② 萧统：《陶渊明传》。

③ 苏轼：《题〈文选〉》。

④ 同③。

（《文选·洛神赋》注引） （《北堂书钞》百十） 怨秋夜之未央。……

张、蔡的两篇赋都是残篇，无法全部对照了。但三篇赋的艺术形式是一致的，模仿迹象是明显的。因此，《闲情赋》只摘取几句也就够了。

《闲情赋》的叙文，揭示了作品的主题。所谓“检逸情而宗澹泊”。一归“澹泊”，把情检来或管束（闲）起来，就什么也无动于衷了。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禁欲论。赋的本文，自起首到“举止详妍”为一段，叙写女性的美丽。自“激情音以感余”到“终推我而辍音”为一段，描述追求爱情的迫切心情。自“考所愿而必违”到“终阻山而带河”为一段，表示这种爱情追求之终于失望。“迎清风以祛累”以下六句结尾，便是表达灰心失望以后消极的人生观。通过四段文章，把全赋的最后宗旨，即假托追求女性的失败比喻追求功名理想的失败，表达出作者个人中心的“悲观主义”。结尾六句，值得注意。

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尤蔓草之为会，诵召南之余歌。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

《诗经·郑风·野有蔓草》：“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邂逅相遇”，既然无望，所以抱怨《野有蔓草》诗所谓的会见。《诗经·召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有游女”，既然不可求，所以只好把歌唱《汉广》诗看成是多余的。以隐士清风消除功名欲望，诚心诚意做到万念俱寂，将年青时代的志愿付之东流，把壮烈的情怀停息在空无境界。这就是陶渊明所抒发的消极颓废的个人中心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从张、蔡到陶渊明，是失意的封建士大夫之间一脉相承的思想感情。

如同伯夷叔齐一样，陶渊明既然抱着“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绝世隐居，安贫守贱，就有可能陷入“悲观主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闲情赋》的产生是有它的必然性的。这类作品渗透着消极没落凄厉感伤的情愫，是有毒的东西。它无形中在宣扬“悲观主义”和“民主个人主义”，是容易使读者潜移默化而受到毒害的。

另一方面，刘宋新政权既已建立，陶渊明的门阀地位就更加下降；脱离了仕途，固穷守贱，就更加容易对抗新朝。在《读史述九章》里，他表示要以夷齐为榜样，发扬其“民主个人主义”精神。虽然他写的那种哑谜式的《述酒》诗，没敢赤裸裸地攻击新朝，但还是搬出古代的亡灵，写了其他“豪放”的诗篇，借古讽今，抒发愤懑。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咏荆轲》《读山海经》等诗。

在他的《拟古》诗里，本来已有这样的话：“少时壮且厉，抚剑远行游。……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正如宋汤汉所说：“不事异代之节，与子房五世相韩之义同，……又时无汉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故每寄情于首阳、易水之间，乃以荆轲……而发咏。”^①陶既以夷齐之心为心，就一定以荆轲之怀为怀；他要走夷齐退居首阳采薇而食的隐士道路，他也要歌颂荆轲辞别易水提剑入秦的刺客行为。可见改朝易代之际，这个陶渊明有绝世当隐士的一面，同时就有当遗民消极反抗的一面，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这也就是《咏荆轲》诗产生的主要原因。

《咏荆轲》诗写作的岁月不可考，但历来的研究者都认为晋禅宋后的作品。“晋室既亡，自伤不能从死报仇”^②，以“吊古之怀，洒伤今之泪”^③。因此，陶渊明写这首诗，虽然是在模仿魏朝阮瑀、晋朝左思，但由于借古喻今抒发个人悲愤，诗写得是更为丰富、集中和强烈了。全诗如下：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① 汤汉：《陶靖节诗集注·自序》。

② 翁同龢语。

③ 黄文煊：《陶诗析义》。

这首诗，起首四句为一段，写荆轲刺秦的起因，概括得很平常。“君子死知己”到“羽奏壮士惊”十四句为一段，把送行场面作了集中的具体的描绘，来渲染荆轲这个刺客群。“心知去不归”到“豪主正怔营”八句为一段，夹叙夹议，突出荆轲行刺的“壮举”及其建功立名的“豪情”。最后四句，写作者对荆轲的评价和歌颂。诗的高潮是第三段，诗的重点在结尾。陶渊明异常崇拜荆轲为燕丹报仇的行径，也异常惋惜他奇功的失败，借此表达他自己对现实的不满与哀愤。很明显，作为观念形态来说，这首诗是晋宋易代的大事件在一个封建主义和“民主个人主义”者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诗是歌颂“死知己”“有后世名”的封建武士，是在维护封建主义道德。这样的作品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是反动的东西。

他的《读山海经》组诗共十三首，其中属于“金刚怒目式”的，今举下列两首。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①，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游海淹死的女娃变成了精卫，常常衔着微木片要把沧海填平。和帝争神被斩了头的形天挥舞着干和戚，意志永远凶猛。女娃、精卫、争神者、形天，凡此统归一种物类，是不成问题的，变化了，就是复生了，没有值得后悔的。但是，我徒然有这种以古喻今的设想，光明之晨，哪能等到它的来临！）

巨（臣）危肆威暴，钦馭违帝旨。窳窳强能变，祖江遂独死。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长枯固已剧，鷓鹒岂足恃。

（臣危帮贰负施展威力残暴，钦馭帮鼓背叛帝的意旨。被臣危杀害的窳窳还勉强变成了龙头蛇，被钦馭杀害的祖江却单独遭到惨死。明明上天洞察一切，为非作歹是要不得的。贰负被永久桔锁着固然很痛苦，变成了鷓或鹒也没什么可仗恃的。）

这两首“金刚怒目式”的诗，与《读史述九章》不完全相似，是通过古神话人物借古讽今。过去陶诗的研究者，大都认为它们是仇恨、诅咒刘裕“篡”“弑”暴行的寓言诗。宋真西山说：“渊明眷眷王室，盖有乃祖长沙公之心。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②翁同龢说：“以精卫、刑天自喻，其曰‘巨猾肆威暴’，盖痛斥刘裕也。”^③清邱嘉穗说：“此篇（指臣威肆威暴诗）盖比刘裕篡弑之恶也。”^④研究者们的推断是有道理的。前一首，精卫、刑天云云，的确是自喻，表示他的对抗刘裕至死不变。也透露出既已是历史陈迹，再想生活在那个他认为是好的晋朝已经毫无可能。后一首，以满脑子仇恨、愤慨的心情，斥责刘裕的禅代，诅咒刘裕的统治也无可仗恃。吟味一下这两首诗，就清楚地认识到，陶渊明是在全盘继承伯夷叔齐。他站在遗老、遗少的反动立场，用反对“以暴易暴”的观点，来攻击刘宋政权。很明显，《读山海经》诗反映了陶渊明反动的“民主个人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

在这里，人们容易回忆起鲁迅先生曾把组诗《读山海经》某篇看作是“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鲁迅先生在批评“选文家”和“论客”时，曾以陶诗为例，斥责他们的片面性和实用主义观点，这样说过：“论客们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草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⑤这是针对朱光潜所谓“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⑥的观点提出的批驳。鲁迅先生还说：“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吧。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

① 编者注：宋代流行的陶集原作“刑天無千歲”。北宋曾竑认为此句是“刑天舞干戚”之误（见清陶澍注《陶渊明集》卷四）。此处以逯先生手稿为准，以下同。

② 见王应麟：《困学纪闻》。

③ 见姚培谦：《陶谢诗集》。

④ 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

⑤ 鲁迅：《题未定草》（六），《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二集》。

⑥ 朱光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这才较为确凿。”^①仍然是针对朱光潜这类的研究者而发的，针对“陶潜浑身是静穆”而发的。不难理解，片面强调、夸大陶诗的“静穆”和片面强调、夸大陶诗的“金刚怒目”都是不正确的。鲁迅先生说得很好：“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必须根据鲁迅先生所说的“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真正做到“知人论世”。假使我们顾及晋宋易代期间的社会状态，顾及陶渊明是哪个阶级的人物，顾及组诗《读山海经》写作的时代背景，便认识到这组诗是在反对刘裕的夺取帝位，是在要求保持腐败的东晋皇朝使它免于死亡。根据这组诗的这类基本倾向，就可以断定它不是进步的而是反动的东西了。鲁迅先生说的上述论点，只是要人们全面地科学地对待陶渊明的作品，既不是由于先肯定了“金刚怒目式”才否定“静穆”，又不是因为有人夸大陶诗的“静穆”，证明是错误的，就反过来肯定“金刚怒目式”是进步的作品。我们必须学习鲁迅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五、陶渊明的《形影神》诗和他的玄学宇宙观

东晋末年，江州是个道教、佛教、经学、玄学各种思想互相斗争的典型地区，这在前面曾经简单介绍过。生活在这个地区的陶渊明，受着上述各种思想的影响和制约。从社会关系看，他的亲友或交往的人，有各种思想的信奉者和代表者。以道教说，他的上司江州刺史王凝之是道教徒，他的从弟陶敬远也是道教徒^②。以佛教说，庐山释慧远和他有来往^③，同他并称为“寻阳三隐”的朋友，刘遗民、周续之都是佛教徒。以玄学来说，他的上司桓玄是坚持“自然观”的玄学派。以经学来说，他的朋友祖企、谢景夷等都是讲校礼经的。看起来，陶渊明受各种思想的包围，是在各种思想互相矛盾斗争中，他成为一个服膺“自然观”的玄学的信仰者的。而《形影神》诗便是代表着批判佛道迷信而肯定玄学自然观的一组哲理诗。

用《形影神》这个题目作诗，不是偶然的。它是针对释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和《万佛影铭》等宣传佛教迷信的东西，借用其专门术语，设立此新标题，而反对其“神不灭论”的。隆安二年（398）前后，桓玄和慧远在佛教问题上展开了反复斗争。桓玄作《劝罢道论》，慧远以《明报应论》来答辩；桓玄作《沙门应敬王者论》，慧远就以《沙门不敬王者论》来答辩。《沙门不敬王者论》作于元兴三年（404），包括五个部分，第五部分就是《形尽神不灭论》。《形尽神不灭论》是慧远为佛教“因果报应”说制造的理论根据。它不但嚣张一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辩，而且流行数世，促成了后代哲学上的大论战。它攻击了道教信仰玄学经学，力图巩固和发扬佛教权威。慧远咬定，人死了，形体尽了，但灵魂不灭，因果报应要继续下去。慧远摆开阵势，单枪独马，向着玄学、道教和经学一再发动进攻，继元兴三年（404）《形尽神不灭论》之后，义熙八年（412），他又刻石立佛影，义熙九年（413），写了《万佛影铭》。在石上刻佛影，他认为这不是立体的形，但能够给万佛传神，这就是“形尽神不灭”的具体化。他的《万佛影铭》又说：“廓矣大象，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同样在强调“形尽神不灭”。在立《万佛影铭》的时候，他又鼓动大批的观众来参加，并派人邀请谢灵运给他撰写《万佛影颂》，这个释慧远简直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活动。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陶渊明写了《形影神》诗。以组诗的形式，对慧远进行了批评。诗的历史背景既明，其产生在义熙九年（413）也就不成问题了。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形影神·序》）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形赠影》）

① 鲁迅：《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二集》。

② 见《祭从弟敬远文》。

③ 见《莲社高贤传》。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
云能消忧，方此诘不劣！（《影答形》）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受）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

在序里，作者认为“营营以惜生”，即惨淡经营来顾惜生命是违反自然的，是很苦的。因为惨淡经营本身是伤生的，用伤生的办法去惜生，这是非常糊涂的。序文根据玄学家的“自然观”训斥了那些“营营以惜生”的人们。按元兴元年（402）七月二十八日，慧远曾经同刘遗民等在“精舍”^①“无量佛”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②。由于害怕轮回报应，惨淡经营地搞了这次大规模的迷信活动。元兴三年（404），慧远写了《形尽神不灭论》，义熙八年到九年（412—413），又是立佛影，又是写《万佛影铭》，无非要把人们推进佛教迷信的深渊，使人们整天在宗教迷信中讨生活，自讨苦吃。陶渊明不同意这种违反自然的糊涂行为，也就要揭露慧远等毒害人们的实质罪恶行径。《莲社高贤传》说：“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日：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陶渊明既然“攒眉而去”，对佛教徒直接表示了无言的反对，当然也就会用哲理诗作进一步的批判了。

看看陶渊明怎样通过形影神的赠答、解释来驳斥“神不灭论”的吧。在《形赠影》里，形对影说：“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肯定形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是要死去的。对于死，形感到凄恻，含着惜生的悲哀，从而想到以酒消忧。在《影答形》里，影又对形说：“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再一次肯定形影的同归于尽。说感到五情发热，也就是含有惜生的悲哀，于是要求形立善遗爱。通过形影的对话肯定人生要死、身名同尽以后，于是在《神释》里，用神对形影的解释，阐述了作者形尽神灭的正确观点。《神释》：“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受）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的这些解释，明确指出形神是相结合的，形存神存，形谢神灭，灵魂是随着身体的死亡而死亡的，人类的形和神是不能分开的。不能设想人死了，形体倒下去了，人的灵魂还单独存在。贵贱贤愚，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死的，也没有一个是形尽神不灭的。可见陶渊明的这种“自然观”，在分析作为自然人的形和神的关系上，在揭露佛教迷信这种唯心主义的谬误上，是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的。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就应该加以肯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梁朝范缜以《神灭论》彻底批判佛教迷信的一二百年以前，居近庐山到过莲社的陶渊明，已经以他的哲理诗《形影神》针锋相对地对《形尽神不灭论》进行了有力的抨击，这在中国诗歌史上应该大书特书。

另一方面，由于肯定形死神灭，这组诗对道教迷信也作了有力的否定。当时的道教，宣扬金丹可成，神仙可学。学道者可以肉身成圣，可以长生久视。这种宗教迷信，《形影神》诗同样表示了完全相反的态度。《形赠影》说：“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这是说为万物之灵的人，不但不能同天地永存，连一年一荣枯的草木也跟不上，是找不到长生久视的“腾化术”的。又《影答形》云：“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昆仑、华山，是道教徒宣传为神仙聚会之所，但这条修仙之道谁也走不通。就像《神释》所说的，“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受）永年，欲留不得住”，那种长生不老的丹沙符篆不过是空头支票而已。

陶渊明反对宗教迷信，反对佛道迷信是比较一贯的。义熙九年（413），在写《形影神》的同时，

① 和尚斋房。

② 共同要求死后能到“极乐”世界。

他的《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诗说：“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即事如己高，何必升华嵩。”同样是对宗教迷信的否定。在这以前，陶渊明久已具有此种倾向。八年之前，他的《归去来兮辞》说：“富贵非我愿，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十年之前，他的《连雨独饮》诗说：“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都说明他的坚持自然观、反对宗教迷信早在四十岁以前就已经确定了。陶渊明四十岁以前，即元兴三年（404）以前，正是桓玄等玄学家同慧远等佛教徒展开争辩的时候。

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所坚持的玄学家的自然观，其本身是具有矛盾性的。这种自然观，一方面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用来分析作为自然物的人的生死存亡问题，驳斥佛道迷信谬论，证明成佛成仙的欺骗性，那是强有力的。它使陶渊明的哲理诗获得了突出的成就，因为这种哲学思想在说明自然现象上具有科学性和战斗性。可是，另一方面，这种自然观本身带有形而上学性质，用来观察人类社会历史问题，则又含有唯心主义的虚伪性，往往使人陷入“蔽于天而不知人”的错误境地。在《形影神》诗中，陶渊明否定“立善”，强调“委运”，他的这种一本“自然”的人生观，就显示了他的严重的阶级局限性。

为什么反对佛教迷信？反对佛教迷信的目的何在？梁范缜与陶渊明就有区别且很悬殊。范缜反对《神不灭论》，反对佛教，出于强烈的拯世救国的责任感和爱国心。他决心把那种害政蠹俗、破坏生产、贻误国防、助长奢侈的佛教加以抨击和清除。在他心目中，佛教迷信使“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殫于土木”^①，范缜是关心国家和人民的。然而陶渊明的反佛教却不是这样，在《形影神》诗中没有丝毫关心国家人民的思想感情。刚好相反，陶渊明反对《神不灭论》，是站在个人立场、以个人苦乐人性和理性为出发点的，是用道家的玄学世界观根本否定佛教迷信而肯定委运随化、自然无为的人生观的。同时，这也反映了陶渊明没落门阀地主的“个人中心”和“精神第一”的内心追求阶级偏见。

《形影神》诗提出三种生活思想。一是以酒消忧，二是立善遗爱^②，三是委运随化，顺应自然。经过反复论辩，否定了以酒消忧和立善遗爱，最后把听从命运、顺应自然的人生观肯定下来。这当然是针对“营营惜生”者而发的，在批驳宗教迷信方面是有意义的。但是，也明显表现出陶渊明的玄学世界观支配着他的自然无为的人生观。因此，陶渊明认为以酒消忧和立善遗爱都会导致“甚念”（过火的念虑），都是个人的苦，都是伤生的。这样一来，陶渊明的所谓顺应自然、委运随化就只意味着放弃一切的作为和斗争，对人生抱自然无为的消极态度。消了宗教迷信的毒，又放了道家玄学的毒！

主张自然，一方面是要顺应自然避免个人伤生，《形影神》诗可以代表。另一方面则要皈依自然追求个人的“得生”，他的组诗《饮酒》的某些篇章可以作为代表，这两个方面包括了陶渊明自然观的全部内容。他反对宗教迷信神仙怪异是从四十岁前后就开始的，他皈依自然追求个人“得生”的《饮酒》诗，正是他三十九岁的作品，这说明他的抱持自然无为的人生观已有较久的时间。《饮酒》诗第五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这是叙述他如何皈依自然达到称心得意的诗篇。“此中有真意”，什么是“真”呢？所谓“真”本之老庄，就是自然。《庄子·渔父》：“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法天贵真，即《老子》所说“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真意就是自然意趣。以“真”来喻自然也见于其他诗篇，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是说鸟飞鱼游的状态就是真。真等于自然，所以《归园田居》诗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可见真意就是从鸟飞鱼游那种状态感受到的自然意趣。

诗的前四句为一段，表达作者对于自然观点的平时陶养。作者以自然一义规范生活，顺应自然，

① 范缜：《神灭论》。

② 办好事情让后人崇拜爱慕。

丢掉世俗累赘,做到意静心远。后六句为一段,写他对当前活的自然景物的感发和欣赏。他寄情于归鸟,从归鸟的那种真朴状态的感发中吸取所谓自然意趣,从而达到得意忘言的境界。得意也就是“得生”。《饮酒》诗第八篇可以同这首诗互相补充说明: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觴虽独尽,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这首诗的主题与上一首基本上是相同的。“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同写生活的静,“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与“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同写心情的远。两诗的结尾又都是通过夕鸟归林满含原始生活意趣(自然意趣)的刹那感受,写隐居生活的真的境界。他向往原始生活状态,认为能获得这种原始生活意趣就称心得意,所以把来自自然景物的感受和欣赏看作是生意的获得,所谓“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陶渊明以鱼鸟的生活状态寄托他的生活理想,是把玄学家的自然观有意识地运用到生活中去。陶渊明这样认为:当时封建统治下的社会生活是不好的。正如《感士不遇赋》所说“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原始生活状态是好的,合乎自然的所谓“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可是,原始社会又一去不复返了,于是便设想,如果精神上皈依自然,按自然规律来生活,也就在精神上能够暂时得到原始生活的真,得到“生”的意趣。正因有此思想,他才时常以不生不养时代为遗憾,感叹“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并希望在万能情况下追效那种“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道家玄学来规范生活,坚持自然无为、寄迹鱼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东晋末年一般门阀贵族的共同思想。王羲之《兰亭集》序说: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

陶渊明对于自然景物的感受和欣赏,搞到得意忘言,获得“生”的满足,这和王羲之所谓“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基本上是相同的。又《世说·言语篇》:

简文(晋简文帝司马昱)云:一入华林园,直觉鱼鸟来亲人。会心处,都不在远,翳然林木,便尔有濠濮间想。

这里是说,由于暂时接近鱼鸟,马上就进入了真朴的自然境界,所谓“有濠濮间想”。这种“欣快”的世外感受,认为用不着远离人间,只要主观上注意去领会便可以做到,所以说“会心处,都不在远”。而有了这种感受,便好像物和我成了同群,所以说“直觉鱼鸟来亲人”。这样就算是能暂时回到原始生活状态中去,跨到得意或得生的精神境界。这种生活思想情调,陶渊明和晋简文帝又是本质上相同的。

相同的生活思想情调,来源于相同的社会和阶级立场,说明陶渊明与其他门阀贵族同样沆瀣一气。他们是剥削者,以“自然玄学”维护其社会封建统治地位,一切以个人为中心,把个人苦乐看得重,丝毫不关心国家和人民。他们是唯心论者,把“精神生活”放在第一位,用自然学说填补灵魂上的空虚。

表现这种思想感情的诗具有毒害消极作用,它使人们逃避现实,一味地追求精神上的自我陶醉;谁要是一旦中了毒,谁就会把“精神生活”当作人生第一要义,而放弃积极的社会斗争,走上虽生犹死的生活道路。这样的作品是陶渊明消极没落的人生观的反映,是落后的有毒的东西。但是,今天的某些研究家,却把这类东西,大肆地加以美化和兜售肯定。为了所谓给“纯艺术”理论张目,竟然将所谓“静穆”二字定为衡量“伟大诗人”的标尺。有人说:“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①又说:“谈到感情生活,正和他的思想一样,渊明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②换句话说,凡是不浑身静穆的,就不算伟大诗人。对这种错误提法,鲁迅先生曾给以严肃批判。鲁迅说:“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

① 朱光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② 朱光潜:《诗论》第十三章“陶渊明”。

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①一针见血地反驳了错误观点。

从整部陶集看，陶渊明的确不单单是“浑身静穆”，在某时对某事他有不静穆的一面，即“金刚怒目式”的一面。朱光潜以“就事论事”的办法来就诗论诗，选出陶诗的《结庐在人境》的一篇，摘出“悠然见南山”一句，武断判定陶渊明“浑身是静穆”，浑身静穆就伟大，这关系到一个文艺批评上的原则问题。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②缩小、凌迟、断章取义，这正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在作怪。实用主义的“奥妙”是，它可以让研究家们随心所欲，想把陶渊明打扮成什么样就打扮成什么样的人，为研究家个人目的效劳。鲁迅先生说的“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这种正确的原则，朱光潜是不肯一顾的！

把“静穆”或“调和静穆”规定为衡量“伟大诗人”标尺的目的在于，“我们一般人的通病是囿在一个极狭小底世界里活着，狭小到时间上只有现在，在空间上只有切身利益相关底人和物；如果现在这些切身利益关系的人与物对付不顺意，我们就活活地被他们扼住颈项，动弹不得，除掉怨天尤人以外，别无解脱的路径。渊明像一切其他大诗人一样，有任何力量不能剥夺底自由，在这‘樊笼’以外，发现一个‘天空任鸟飞’的宇宙”^③，又说：“渊明在情感生活上经过极端底苦闷，达到极端底和谐肃穆。他的智慧与他的情感融成一片，酿成他的极丰富底精神生活。”^④够了！朱光潜又是反对讲厉害关系，又是反对怨天尤人，千言万语，无非是要青年学生放弃政治斗争。要“解脱”，要学精神胜利法。本来极苦闷，却要变得和谐肃穆，本来是在“樊笼”之内，却要“在这‘樊笼’之外，发现一个‘天空任鸟飞’底宇宙”，像阿Q一样，享“有任何力量不能剥夺底自由”。这就是朱光潜给青年学生制好让他们照样模仿的“个人自由主义”者的标本，他是希望青年学生都变成这种标本的人物的。在1948年的年代，不管你怎样苦闷，也得“静穆”起来，决不能振作起来同扼住你颈项的反动派进行斗争，要学陶渊明那样“和谐肃穆”，像个“伟大诗人”的样子。好一颗美丽诱人的糖衣炮弹啊！

谈到这里，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对待陶渊明“悠然见南山”一类东西，也就不必多说了。

六、陶渊明的嗜酒和守穷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曾为自己的性格作过“性嗜酒”的结语。颜延之给陶渊明作诔文，便说他“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把他塑造成“爱酒又爱闲”^⑤的人物。传说越久，夸张越厉害，所以梁萧统时候，就“有疑渊明之诗，篇篇有酒”^⑥，而唐白居易则直接说“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⑦。宣扬越来越甚，后来连“醉石”“王宏冈”等附会的东西都相继出现。用鲁迅先生一句话说：“陶潜先生，在后人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⑧他的原来面目由此丧失了不少。

陶渊明的酗酒生活到底怎么样？他的饮酒和生活遭遇、写作都有何关系？饮酒诗篇反映了何等思想情调？应该如何去批判和对待？实在都有必要作一次具体调查研究。

我曾经就陶集现存诗文一百四十二篇作过一次统计，凡说到饮酒的有五十六篇，约占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四十。根据这一统计，说明陶渊明有关饮酒的作品确实占了不小的比重。

这五十六篇作品，把其中有年代可考的四十多篇，按年代前后排列一下，便会看到他的饮酒生活，从三十九岁到六十岁，可分为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情况是不相同的。

第一阶段，从三十九岁到五十岁，这十一年是他纵情酣饮的主要阶段。

① 鲁迅：《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二集》。

② 同①。

③ 朱光潜：《诗论》第十三章“陶渊明”。

④ 同③。

⑤ 欧阳修：《偶书》。

⑥ 萧统：《陶渊明集序》。

⑦ 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

⑧ 鲁迅：《题未定草》（六），《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二集》。

三十九岁那年秋，他“偶有名酒，无夕不饮”，继续不断地“酣饮赋诗”，竟写下了二十首组诗《饮酒》。以《饮酒》名篇，如此大量的赋诗，很值得注意。四十岁时，出为镇军参军的前夕，写了《停云》《时运》《荣木》，写了《连雨独饮》；四十二岁由彭泽归来以后，写了《归去来兮辞》和《归园田居》。

从四十五岁到五十岁，所写诗篇，仍然反映了陶的纵情酣饮。不同于前的是，这些诗篇表露出作者是怎样的感到人生无常，要求及时行乐，以酒消忧。代表作品有《己酉九月九日》《游斜川》《杂诗》第二首。

第二阶段，从五十一岁到五十七岁。这七年是他家贫缺酒、亲友招饮的阶段。

五十一岁，是陶渊明耕田劳动日益艰苦、贫病交加的一年。这时他的痼疾（疟疾）一度增剧，几乎死去。在病中写了《自祭文》和《拟挽歌辞》。这首《拟挽歌辞》和他约在五十四岁时写的《九日闲居》诗，五十六岁时写的《岁暮和张常侍》诗，都抒发了缺酒的悲叹。而五十七岁写的《于王抚军座送客》诗，则又代表着他在被人招饮时的写作。

第三阶段，六十岁这年以后重新获得酣饮的另一个阶段。

宋元嘉元年（424），陶渊明的酒友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路过寻阳，送钱两万给陶渊明。史称，陶渊明将这两万钱全部交给酒家，零碎地向酒家取酒。好多年缺酒了，得到颜延之的周济，他又有了酣饮的机会。陶集现存两首《答庞参军》的诗，一为五言，一为四言，都是这一年写的。诗云：“我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又云：“我有旨酒，与汝乐之。”可见垂老的陶渊明，又在“酣酒赋诗”了。

从这三个阶段的饮酒生活中，就可以认识到，陶渊明并不是一辈子都过着酣饮生活。五十一岁后几年间，他一再提及“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九日闲居》）、“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同上）、“屡缺清醑至，无以乐当年”（《岁暮和张常侍》）。缺酒乃至无酒可喝已是长时期的事。六十岁后所以又有酒可喝，是由于颜延之送给他买酒的钱，否则这一年中还是过不了酒瘾。他的《五柳先生传》说：“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确实是他老年写的（不是年少时）自传或“实录”，概括了他由五十一岁至六十岁的饮酒生活。

弄清楚这一点，不等于说陶渊明不嗜酒成性，也不等于说他的饮酒诗篇就可以一概肯定。刚好相反，我们把握了这一点，就更能断定他是嗜酒的，而且他的饮酒诗篇是必须进一步加以分析批判的。陶渊明的饮酒诗反映的思想情调各篇并不相同。有一类是叙述父老邻曲集会和劳动生活的，这部分作品有的比较好，例如他脱离了桓玄，在家居住，三十九岁那年写的《饮酒》，就有这样两篇：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褰襟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觴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一篇写决心摆脱仕途，不肯同流合污；一篇写和父老欢聚，达到得意忘形地步。文字亲切朴素，思想感情也是比较健康的，不至给人以消极影响。

在耕田劳动方面，他在四十六岁时写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反映了劳动之后的休息生活，所谓“斗酒散襟颜”。这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可以从略。又例如他四十八岁时移居南村，写了《移居》诗两首，第二首云：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这时是义熙八年（412），正值刘裕执政时期，社会暂时安定，农村生产有一定恢复。陶渊明一直从事耕田劳动，接近了农民，对农耕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正是在这种现实生活感染之下，他写了这首诗。诗在农村生活气息较浓，叙写较形象，一定程度上表现了那种满足自给自足的生活现状

的小农心理。要努力耕作，要同邻人生活得好，盼望丰收，希冀能长久维持当前满意的生活，整个诗还是比较好的。

有一类是借酒刺世的作品。他作了桓玄官吏，而桓玄篡了晋朝，虽然他及时引退了，仍然要受到社会的非难，对此他不能不发牢骚。《饮酒》诗第十三首云：

有客常同止，取舍逸异境。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

独醉的一士指自己，独醒的一夫指一般封建士大夫。醉士和醒夫，虽然处在一个社会，但取舍各异，彼此是格格不入的。士醉了，要向不合理的封建礼俗表示兀傲，他的醉反而使他超凡出众；有的人表面上是清醒的，实际却很愚蠢，是糊涂虫。陶渊明以此肯定了酣饮的行为：白天喝酒，晚上仍然要秉烛酣畅一番，以保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境界。《饮酒》诗的最后一首云：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在诗中，作者凭着他并非正确的历史观，指责当前的封建礼俗。而在诗的结尾，作者又提出醉酒的重要性和个人意图：“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这就是说，自己不酣饮，就不清醒，就不能大胆向不合理的封建礼俗作斗争，就对不住头上这项“儒冠”的巾。但讽刺封建礼俗，在别人看来，不仅是不对的，而且是大逆不道，是罪人。陶渊明承认自己是“罪人”，酒后的话有“谬误”，只有要求故人原谅了。

又有一类是哀伤生活困苦，借酒来排遣的。《杂诗》第七首云：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尝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已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

他尽量表白甘心“安贫守贱”，压根就不愿意当官；物质生活要求也是很低的，只望“御冬足大布，粗絺已应阳”。但坚持田桑劳动的结果却是“寒馁常糟糠”，于是“哀哉可伤”起来。把这种遭遇归咎于无法对付的“理”，羡慕“人皆尽获宜”，只好为“拙生失其方”“陶一觞”了。

陶渊明发了这些牢骚，还算比较天真的。长期的忍饥受冻，使他对个人温暖加倍关心起来，过去吹嘘的那种遗世的“精神生活”，这时候不再提了。过去那种孤高自赏、啸傲自负的态度也变了，觉得事事不如人，承认自己是“拙”了。

五十岁距三十九岁仅仅十一年。如果把三十九岁写的《饮酒》诗“秋菊有佳色”篇同这首《杂诗》比较一下，便会发现在思想情调上已有很大变化。前者反映的是没落门阀贵族的玄学自然观，后者反映的是一个“躬耕自资”者的贫困生活，耕田劳动对陶渊明的写作显然是有作用的。

最后一类，是反映消极颓废人生观的东西。这一类作品，不但为数较多，而且代表着他的主要写作倾向。这一类作品的突出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以酒消忧”。

陶渊明把酒的消忧或忘忧作用看得很高。他说：“酒能祛百虑”（《九日闲居》）、“试酌百情远”（《连雨独饮》）。可见他认为酒可以使人忘却或消除所有的忧虑。他的饮酒诗篇提及忧虑的有下列几个方面：

有忧虑光阴虚度、功名不成的，如四十岁写的《荣木》诗，五十岁以后写的《杂诗》“白日沦西河”篇。有忧虑儿子不肖、不能永继他的门阀“荣誉”的，《责子》诗就是突出事例。然而在饮酒诗中，占最大比重、表现作者主导倾向的则是忧人生无常，要以酒忘忧、及时行乐的东西。在他三十九岁写的《饮酒》诗说：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又说：“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继尘羈？”又五十岁写的《游斜川》诗云：“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

日非所求。”

这类作品不论是忧功名不成的，忧儿子不肖的，还是忧人生无常的，都充满个人主义和颓废思想。作者不是关心社会，关心国家人民，而是在个人的穷达得失上，门户地位升降上，生命的长短、生活的苦乐上，一味地兜圈子，伤脑筋，而不得不利用酣饮来消除、忘却一些无谓的忧愁。作者胸怀是渺小的，是悲观消极的。尤其是作者那些忧伤人生无常，要以酒忘忧、及时行乐的东西，含有极大的毒害作用。它很容易使读者颓废起来，一味贪生怕死，嗜酒享乐，有可能堕入虽生犹死的深渊之中。白居易就曾经说陶诗是“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①。足见这类诗对后代起着多么大的消极作用。请再看看他的《拟挽歌辞》吧。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在昔无酒饮，今旦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

这种模拟没落门阀大地主西晋陆机的挽歌，本身就显示了门阀地主的没落性。尤其是陶渊明这样的为“以酒消忧”及时行乐作宣传，其毒素之大、害人之深就不言而喻了。

陶渊明的《杂诗》还有这样一首：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夕），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

这首诗不但向别人宣扬那种“及时行乐”的颓废思想，而且为他个人绘出一幅大地主阶级骄奢淫逸的剥削生活蓝图。要亲戚在一起享乐，要满堂子孙养尊处优，要歌童舞女给他吹奏弹唱，要有吃不尽的菜肴喝不尽的酒，松开腰带尽情吃喝，晚餐一完就睡觉，日上三竿不起床的享尽天伦之乐的图画。其生活愿望不但是落后的，而且是反动的。

不难理解，陶渊明饮酒诗篇的主要倾向是以酒消忧，是在反映他的人生无常、及时行享天伦之乐的追求和没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具有毒害作用的东西。

这里接着谈谈他的守穷问题。

陶渊明的诤传和他自己的诗文，都在说他弱年二十岁时就遇到“家乏”或者“家贫”了。实际，一直到他四十岁彭泽解职归来，他有田庐可归，有酒可饮，有饭可吃，有僮仆侍候，算不得怎么穷。只是在他青年时代，他这个门阀世家已无人居官为宦而已。陶渊明的真正守穷，是在五十岁以后，这从上面的分析研究已经明白无误。

五十岁以后这段守穷时期，对陶渊明的诗文写作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时期。有许多可以当作历史读的诗是这个时期写的。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咏贫士》《杂诗》《乞食》《有会而作》等诗，可以看出在封建社会中一个甘心“躬耕自资”的知识分子是难以实现他的愿望的。上述这些诗向来不为研究者所注意，这里试予分析介绍。

义熙十四年(418)，陶渊明五十四岁，晋朝下诏征他为著作佐郎，他没有接受。这年写了《怨诗楚调》诗，诗云：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僂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域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

这是表现穷苦生活思想的代表作品之一。作者自称是善良和勤奋的，但善良和勤奋换来的是“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的悲惨处境。在作者看来，农耕是衣食的保证，劳动是善良的行径，但是坚持善事，努力耕作，所得到的是家庭破败和饥寒交迫。作者明确指出这不是因为不勤劳，也不关

^① 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

什么天道鬼神因果报应。生活本身证明，“念善”成为灾难之源，耕作成为饥寒之源。“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这种可悯的心理描写表现了作者饥寒生活达到多么艰苦的地步。作者说“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表面上不怨天尤人，实际上在诅咒封建社会制度不合理，是在愤恨他得不到知心的朋友。

《咏贫士》组诗共七首。一、二两首是自咏，从三至七分别咏的是：荣期、原宪、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蔚、黄子廉等贫士。但是，这个组诗乃是召唤古代“贫士”的亡灵，表述作者当前生活的悲慨。以古人酒杯浇个人胸中块垒，归根到底它是一组抒情诗。

这组诗同样是作者生活的反映的产物。在组诗的第二首、第三首中，作者就透露出《咏贫士七首》是针对门生弟子的质难所作的一次答辩。第二首说：“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第三首说：“岂忘裘轻裘，苟得非所欽。赐也徒能辩，乃不见吾心。”他把门生弟子看作子路和子贡，把自己当作了孔夫子。显然是因为他的门生弟子对他有所质难，他才写了这组诗回答其弟子门生。

东晋门阀世族有招养门生的习例，如谢灵运等且曾大量收容，陶渊明也是有门生的。史书陶传均称：“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间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忤也。”^①王弘为江州在陶渊明五十四岁、义熙十四年（418）以后，说明他在贫困的晚年还有门生，此辈门生就是《咏贫士》诗答辩的对象。

《咏贫士》答辩的是什么问题？这由诗列举的子路、子贡两件事，便知道还是关于当官和守穷的问题。《论语·卫灵公》：“（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又《论语·子罕》：“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韞椟而藏诸？求贾价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门生弟子既然和陶渊明生活在一起，自然也要饿肚子。也就可能反对他的守穷，催促他再次出仕。据本传，义熙末（十四年）晋朝曾征召他当著作佐郎，他如果出沽美玉，不正是一个关键时刻吗？门生有了像子路、子贡那样的质难，陶渊明也就写成了《咏贫士》这样的诗篇。

《咏贫士》诗表述了陶渊明的贫困生活和态度，也反映了他的封建主义思想和落后的世界观。在诗里，作者一方面直接写了他耕田以后的贫困生活和态度，“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言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凄厉岁云暮，拥褐暴前轩。……倾壶绝余粒，窥灶不见烟。……何以慰吾情，赖古多此贤”。另一方面又借古代贫士的生活行为，将本人的贫困生活和态度影射一番：“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高音。……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忘裘轻裘，苟得非所欽。”又说：“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等等。一句话，还是守穷不当官的问题。好读书的陶渊明，从书本上看到一些安贫守贱的古贤前修，吸收了不少他认为美好的抽象教义，这些恰恰和当下的政坛人物和政治制度不相容，或者甚多矛盾冲突。处于这种矛盾冲突情况下，他要免除贫困去当官，便认为是给新朝效劳同世俗同流合污；要维护个人“操守”和心地高尚来退隐，就要守穷处贱、忍受饥寒。《咏贫士》就是集中表现陶渊明的贫困生活，集中表现他的那种“贫富常交战”的内心痛苦。在诗里，作者还借对黄子廉那种“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的描写，来比况自己，表达自己和妻子的同甘共苦，对儿子的内愧自咎。《南史·隐逸传》曾经说陶渊明“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云云。又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也说：“僂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抱兹苦心，良独内愧。”可见他写黄子廉，是紧紧结合他本人处境。这样一组诗，自然会使得读者同情他的贫困生活，肯定他的固穷精神和道德品质的。

^① 沈约：《宋书·隐逸传·陶潜传》。

但是，组诗在表述作者生活态度的时候，也连带反映了作者的阶级思想意识和世界观。组诗作于作者五十四岁以后，正值晋宋易代之际。组诗的第一首云：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余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这里“朝霞开宿雾”两句指喻晋宋易代之际，“朝廷之更新，诸臣之趋附”，“迟迟出林翮”二句，寓托自己的不与众同，守拙退隐^①。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陶渊明才悲叹见不到余晖，悲叹不遇知音。晋朝不比宋朝好，当官不一定比当隐士坏，陶渊明因为反抗刘裕篡晋才弃世守穷，因为弃世守穷才忍受饥寒，而只有忍受饥寒才能维护着他个人的仁义道德。这样，陶渊明所强调的仁义道德，实质上就是他忠于晋朝的封建主义伦理观念乃至门阀观念。其他的东西是没有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组诗还反映了陶渊明的今不如古的落后的世界观。组诗说：“袁安门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刍藁有常温，采芣足朝餐。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这是说社会上所以有弃官的贫士，是由于封建政治的不良。组诗又云：“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弊襟不掩肘，藜藿常乏斟。”这是说尧舜时代过去了，弃官的贫士也多起来了。联系起来看，这实际是让人们认为，弃官的贫士所以愈来愈多，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坏。尧舜时代以后的贫士都是怀才不遇的。这种观点，是在美化那些不关心国家人民的隐士，是在要求人类社会开倒车，走回头路。

在晚年，陶渊明还有《乞食》和《有会而作》两首诗。《乞食》诗是一首真实乞讨的作品。其中所写的叩门讨饭的窘状和受食以后的报恩心，都是比较深刻的。诗所表现的作者的饥饿之苦，多少使人们认识到封建社会的不合理性。

《有会而作并序》通过序和诗表达了陶渊明的贫困和悲愤。

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美，孰敢慕甘肥。……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

序和诗反映了陶渊明一生辛苦，老来更是长年挨饿。他拒绝了新政权的征召，而饥饿又引起他难以忍受的痛苦。“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内心的矛盾斗争，竟使他肯定起施粥人黔敖的好心，责备那拒绝吃“嗟来食”的蒙袂（以衣袖蒙面）人的不应该。然而他还是要“固穷”，不要“斯滥”，宁愿追随古代贫士，而不为饥饿所屈服，极其婉转地表达了他的贫困生活。

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宋元嘉三年（426），江州刺史檀道济曾经往访陶渊明。“（渊明）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有会而作》诗大概是针对这一事件或与此相类事件而作的。陶渊明可以到邻舍登门乞食，接受邻人食物，还要“冥报以相遗”。而对施惠的江州刺史檀道济，却拒绝了他的粱肉的馈送。这是否又是他门阀观念在起作用？为什么又表示后悔？值得深思。

七、陶渊明的“躬耕自资”和他的《桃花源记》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毛泽东《七律·登庐山》）

陶渊明没落的门阀地主思想表现在各个方面，而且是比较突出的。如果他只是这样一种状况，那他就不过是生活在东晋末年那个特定时代和陶家那个特定门阀世家的封建文人而已。即使退隐，当了隐士，也写不出较有进步意义的诗文作品。过着寄生生活的地主隐士，和那些剥削压迫人民的地主官僚，是没有什么本质差异的。然而，他确实“躬耕自资”了，勤力地参加了耕田劳动。耕田灌园之外，他还织席子，打草鞋，卖蔬菜^②，接近和熟悉了下层社会生活，这促使他的头脑发生变化。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有可能写出像《桃花源记》这样的作品。

① 参看[元]刘履《选诗补注》、[清]吴崧《论陶》

② 颜延之：《陶徵士诔》称陶渊明“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絢纬萧，以充粮粒之费”。

陶渊明真正从事耕田劳动，是从彭泽解职归来四十二岁时开始的。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诗中，他说他自己“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烦”，丙辰是义熙十二年（416），上距义熙元年（405），恰好是十二年。四十二岁前，他有时也到别业庄田，接触过耕田劳动。如他二十九岁时出任江州祭酒，他说他是“投耒去学仕”（《饮酒》）的。三十九岁时写的《癸卯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诗提到“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可见他那时到庄田去主要是“劝农人”劳动，自己并非正式劳动。所以他在诗里又提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患长勤”，“劳心”“劳力”的反动观点仍然使他左右摇摆。这和他的《劝农》诗所谓“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弗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是完全相同的调子。

陶渊明四十二岁后，写耕田生活或涉及耕田劳动的诗有十几首。其中能够反映他的劳动思想和世界观的有下列三首：《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晋义熙四年戊申（408），陶渊明四十四岁，七月中旬写了《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诗的结尾说：“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东户事见《子思子》，东户季子时代，粮食吃用不了，剩余的便堆积在田头。陶渊明羡慕和梦想那种吃饱肚子无所事事的时代。那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前只有灌田劳动。这几句诗表现了他“躬耕自资”后的生活态度和对于生活的认识。他梦想原始公社生活，要自食其力。实质上是在反对封建社会制度，反对寄生阶级。这种社会思想是进步的东西。诗里也反映出这种观点，即社会的发展是越来越糟的，是今不如古的。因而怀着消极的思想感情，只顾个人生计，不管国家社会，宣扬“绝圣弃智”（“鼓腹无所思”）的道家说教，鼓吹“安贫守贱”的反动哲学，这反映了陶渊明的反动的世界观。

义熙六年庚戌（410），四十六岁的陶渊明写了反映他耕田生活的诗《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盍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庚戌这一年，是江州人民备受战争骚乱的一年。三月，广州刺史卢循起兵侵入江州，与江州刺史何无忌（刘裕将）战于豫章，后者被杀。五月，卢循战败刘毅（刘裕将）于桑落洲（地在寻阳东北江上），七月，卢循自蔡洲南返寻阳。十二月，卢循为刘裕所败，又走还寻阳。从三月到七月，江州寻阳一带成为卢循、刘裕两军事集团的战场。两军对垒战死者几万人，战祸连续不断。正因为如此，直到九月陶渊明才在僻处深山的西田收割早稻。

诗一开头就表述了作者对耕田生活的态度和认识。作者肯定耕田劳动的社会意义。人生首要是衣食，衣食靠劳动取得，“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因此，在衣食生产上，人人要作出有益贡献。寄生阶级既不劳而食又过着损人利己的奢侈生活，这样，势必搜刮农民，势必激化强凌弱、富欺贫的矛盾斗争，所以作者用反诘的口吻喊出“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的呼声，揭露寄生阶级的罪恶。认为不劳而食、无所事事是得不到安生的。在描写耕田生活中，首先说到，在一般情况下，按时耕种就收成有望。日出而作，日入而归，用轻微劳动便有所收获了。然后讲到今年的西田劳动大大不同了。山深霜露来得早，气候提前寒冷，田家怎么会不苦。可是与“四体不勤”的人们不同，虽然周身疲劳不堪，庶几免掉意外祸患的干扰。这意外的祸患也包括卢循、刘裕的火拼。诗的结尾六句，着重写劳动归来后的休息饮食，并对古代逃世归耕的隐士表示由衷的赞赏。

比起前一首诗，这里所反映的陶渊明的思想是更进一步了。他高度评价耕田劳动的社会意义：没有耕田劳动，就没有衣食生产，就谈不到人类生存，揭示了寄生阶级的罪恶。“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把当时终年勤劳不免饥寒的农民都包括在内，对农民抱着深切的关注和同情，有了初步的同呼吸共患难的感情。比起过去只顾个人生计，已有不同。诗里已经含有人人劳动的思想要求，对当时残酷的封建制度有了批判意义。当然，诗也存在着阶级的时代的局限。终年勤劳的东晋农民是

摆脱不了“异患”的。试想一个农耕者可能一时地免于饥寒，而成千上万却挣扎在死亡线上，暂时取得收成的农民，在封建剥削下也随时会遭到破产与死亡。从这一点讲，“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也只表现了作者的侥幸心理罢了。

义熙十二年丙辰（416）陶渊明五十二岁时，从事耕田生活已经十二年了，这时他写出《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诗。现在把原诗和译成的现代语，对列如下：

原诗	译诗
贫居依稼穡，	贫困生活依靠耕种，
勠力东林隈。	卖气力在东林寺陂头。
不言春作苦，	春耕劳苦不用说了，
常恐负所怀。	常常怕辜负了耕田要求。
司田眷有秋，	管田的盼丰收，
寄声与我谐。	传来的话和我很相投。
饥者欢初饱，	饥人最欢快是刚吃饱的时候，
束带候鸣鸡。	把腰带扎好等待鸡鸣。
扬楫越平湖，	挥动船棹越过了平湖，
泛随清壑回。	划起船来随着山涧迂回前行。
皤皤荒山里，	白茫茫的荒山里，
猿声闲且哀。	猿声悠悠哀凄。
悲风爱静夜，	悲风爱在夜静时吹，
林鸟喜晨开。	林鸟喜欢天亮时啼。
曰余作此来，	我从事这劳动啊，
三四星火颓。	看西流火星已经十二回了。
姿年逝已老，	相貌年纪很快就老了，
其事未云乖。	种田事儿没啊丢开。
遥谢荷蓑翁，	向古代荷蓑丈人作揖了，
聊得从君栖。	也算是得到和阁下生活在一块。

这首诗是研究者不大注意的，和《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相同，它是陶渊明反映耕田生活的重要作品。劳动已经十二个年头。劳动到老，勠力到老，但生活仍是饥寒交迫。“饥者欢初饱”“悲风爱静夜”，亲切而生动地描写这种缺衣乏食的生活感受。下潠田既坐落在东林寺旁，又提到“司田”和“我”的关系，他这时所耕种的可能就是庐山僧侣地主的田地，他已沦为一个佃耕者。作者又把荷蓑丈人引为知己，客观上是在抨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也显示了农本位思想的新因素。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两诗，是反映耕田劳动的进步作品。在我国历代诗歌中，这种诗是少有的，它们标志着陶渊明独特的创作成就。这种题材这种思想内容的东西，不但中国少有，世界文学中也是罕见的。它们丰富了我国古典文学宝库，而且将成为世界文学的可贵的财富。

艰难困苦的耕田劳动创造了上列诗篇，也改变着陶渊明的头脑。作为观念形态的《桃花源记》就是当时特定的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有人说它是在刘宋篡晋以后写的^①，有人说它是在晋义熙十四年写的^②，大体是相同的，就是在晋宋篡夺前后、陶渊明五十四岁左右时写的。不管怎么样，它反映的是东晋末年的社会生活，寄托的是陶渊明晚年的思想和理想。

如前所述，东晋末年封建统治和阶级剥削是残酷的，社会一直动乱不安。在江州一带，在频繁

① [明]黄文焕《陶诗析义》：“盖以避宋之怀避秦也”；[清]余良栋《桃源县志》：“惟不仕伪宋一说，深得靖节本旨。”

② [清]姚培谦编《陶谢诗集》眉批引翁同龢曰：“义熙十四年，刘裕弑安帝，立恭帝；逾年，晋室遂亡。史称义熙末，潜征著作佐郎，不就。桃花源避秦之志，其在斯时欤？”

的军阀战争的骚扰、破坏下，广大人民所遇到的掠夺、蹂躏和危害，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这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而荆州一带的老百姓，因为“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①，因为那里“无徭役”“不供官税”。可见江州荆州这一带，阶级剥削压迫更严酷，人民生活更凄惨，自由更缺乏，反抗行动更罕见，人民的生存要求和土地要求更迫切。正是在这种社会生活状况下，人民意识不到自己的力量，只有在幻想中求慰藉、发牢骚，这个地区才有了产生“桃花源”故事的可能性。诚如列宁所说：“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②同时，又正因为生活在此时此地而具有避世思想的陶渊明，才有可能给以艺术加工而写成了《桃花源记》。

这篇作品包括两个组成部分，用散文叙述和诗歌赞唱的联合形式完成了整个故事。

在记中，在散文叙述中，一开始就写了桃花源周围的风物是那样幽美闲静，与战乱丑恶的封建社会是绝缘的，彼此形成鲜明对照：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

接着，作者用生动的笔描绘了“桃花源”这块乐土：

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把“桃花源”的土地、园田、房舍等的美好，耕田劳动和生活的安乐幸福，都集中地描述出来。他们丰衣足食，老少欢乐，表现了理想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块充满人间生活气息的乐土，完全不同于封建迷信中的仙界灵境。值得注意！再进一步，作品写出：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里写了“桃源”人的好客和渔人受到的款待，写了“桃源”人为了避秦才来到此境。他们所以过着如此美好的生活，显然是由于隔绝了汉晋以来的封建社会，从而用“桃花源”作对比揭示封建社会的丑恶和动乱。

这里须特别指出的是，“桃花源”究竟是“世外桃源”，梦想公社生活的人们是不能到此地耕田的！故事结尾，用渔人第二次到来的“遂迷不复得路”，用刘子骥“规往”（规划前去）的未能实现，着重作了答复。这个“世外桃源”对于人剥削人的世间来说，完全是两个世界，是永远求之不得的“乌托邦”罢了。

故事的散文叙述是诗歌赞唱的依据，诗歌赞唱是故事主题思想的发挥，而故事的结尾把两者很自然地联结起来。要寻出主题思想，要追根究底，就要进一步分析作为故事有机部分的诗歌。这里分段次列如下：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
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

① 《宋书·荆雍州蛮传》。

② 列宁：《论两种乌托邦》，《列宁全集》18卷，第347页。

在诗歌里,作者用“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等诗句,再次写出“桃源”人生活的美好与幸福,作为故事散文描写的补充。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诗歌揭示出故事的主题,让读者认识和称颂“桃源”人的那种生活来源于人人劳动的共耕制,也就是说,人人劳动的共耕制是“桃源”人美好幸福生活的源泉。“桃源”人从事耕田时是互相召唤的,日落回家后是各得其所的,这就指出他们是人人劳动、公共耕种的,就不同于封建社会存在的主佃关系,就是“虽有父子无君臣”^①,就是无君无臣的原始公社制。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征丝的“户调”,没有什么“王税”了。所以作品不惮烦地写出他们农耕及时,蚕桑兴旺,衣着朴古,老幼欢乐,目的就是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假如没有封建赋税和徭役,没有封建制度,在人人劳动的共耕基础上,农民通过耕田劳动就可以取得理想生活的。反过来说,汉晋封建社会农民的苦难处境,是封建剥削制度造成的。这种对原始共耕制的憧憬与歌颂,简直就是向农耕者提供发人深省的理想国,向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制度提出了挑战书。

由此可见,《桃花源记》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性的,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它所表现的对于原始公社的回顾与憧憬,在封建社会的阶段里,乃是农民的革命思想的曲折反映。它同样是陶渊明诗文中的特殊成就。必须注意的是,《桃花源记》的写成,说明了作者长期从事耕田劳动以后思想上有了飞跃发展。在开始“躬耕自资”的时候,他还只是抱持着自耕自给的思想,经过长期劳动和穷苦生活使他逐渐有了共耕制的思想,流传的“桃花源”故事才开始同他的观点合拍了。因此,从他写的《桃花源记》,从他写的反映耕田劳动的诗篇来看,正是这些特殊成就使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进步性的诗人之一。

但是,《桃花源记》所表现的那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今天已是反动的东西,这是读者所容易了解的。其次,《桃花源记》毕竟是个乌托邦。作者描绘这个乌托邦,向往这个乌托邦,但是,作者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这种共耕生活还会不会在人世间实现,没有也不可能设想通过什么道路到达这种乐土。刚好相反,作者除了指出渔人“遂迷不复得路”,刘子骥也未曾重游“桃源”以外,又用“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两句诗,表明“桃花源”只是一种幻想,人们是不能到那里去耕田的。并且最后以“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结束他的全部幻想。

《桃花源记》也反映了作者的落后世界观。这篇作品加工了民间故事,写进了合理的愿望和要求,但是同时也显示了作者对《老子》道家学说的继承。显然《桃花源记》对《老子》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有所扬弃的。譬如,《老子》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里特别写了“桃源”人的“来往”,不但往来,而且是“斑白欢游诣”。《老子》讲“小国寡民”,这里“民”也是“寡”的,但扬弃了“小国”。如果还是“小国”,就有小国之君,就不能无政府组织,就不能“无王税”了。但是,在 worldview 方面,陶渊明与《老子》仍然是一致的。认为原始社会的愚昧生活状态最真、最好、最自然,世界是越发展越糟糕,从而主张“绝圣弃智”,主张无诗书“历志”,主张“于何劳智慧”,同样是在走复古道路。从陶渊明来说,他的这种落后的玄学世界观,是四十岁以前就形成了,而且一直保持到他写作《桃花源记》时,这与农民阶级是不一样的。即使他反对封建赋役,反对寄生阶级,但也决不只会因为殷切而执着地憧憬原始公社而激发起革命的热情,这就是他的思想发展的辩证法。

附录:

关于先父《评陶渊明——〈陶渊明集〉校注代前言》手稿的说明

逯弘捷

先父逯钦立(1910—1973),字卓亭,号祝本,曾用名勤力等,山东钜野人。1935年,先父以优

^① 王安石:《桃源行》。